

中国反贫困理论研究的进展与创新

檀学文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 北京 100732)

摘要: 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借鉴国际反贫困理论, 按照反贫困研究的一般逻辑展开反贫困研究, 形成了丰富的研究成果。文章从贫困理解和标准、贫困识别和瞄准偏差、反贫困战略、反贫困经验、消除贫困的理论解释五方面对国内反贫困研究的关键议题进行总结, 重点考察演变轨迹和理论创新。中国反贫困研究是一个学习与创新同步的过程。在贫困界定、标准比较、识别和瞄准偏差等实证研究方面借鉴了已有理论方法。在综合性反贫困战略、绿色减贫、精准扶贫、益贫市场、逆向资源配置等学理研究方面具有较明显的理论创新特征, 但研究仍不够充分。

关键词: 反贫困理论; 消除贫困; 开发式扶贫; 理论创新

中图分类号: F03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257-0246 (2024) 01-0071-10

引言

改革开放后, 中国开始分阶段实行不同的反贫困战略和政策, 逐步提高贫困标准和瞄准精度。在包容性增长、社会保障制度等多种因素协同作用下, 中国实现了消除绝对贫困的目标, 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的减贫道路。中国的反贫困研究几乎与中国反贫困实践同步展开, 且密切交织在一起, 形成了丰富的研究成果, 呈现较鲜明的阶段性特征: 20 世纪 80 年代关于扶贫资金管理、贫困地区经济开发的研究较丰富; 20 世纪 90 年代关于反贫困战略、贫困标准与测量的研究较多; 进入 21 世纪以来, 关于各项政策、因素的减贫效果的实证分析评价大幅度增加, 对贫困定义和标准的分析有所深化, 对扶贫瞄准偏差的研究在 2005 年以后趋于增多; 脱贫攻坚以来, 关于相对贫困和多维贫困、中国消除贫困经验和解释以及对下一阶段反贫困战略转型的研究更为关注。

经典的贫困及反贫困理论主要产生于发达国家及国际组织, 已经形成相对完备的理论体系, 对发展中国家的反贫困研究起到了积极的指导作用。就贫困经济学而言, 既有针对发达国家的研究, 也有针对发展中国家的研究。^① 二者既有相似的分析框架, 又针对各自独特情境, 例如关于发达国家的研究更加强调失业、歧视、福利制度激励等问题, 关于发展中国家的研究则更加强调经济增长、农业政策、教育参与等问题。联合国社会发展研究所 (UNRISD) 利用相对一致的发展战略和公共政策分析

基金项目: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创新工程研究类 A 类项目 (2021NFSA02)。

作者简介: 檀学文,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 创新工程项目首席研究员, 研究方向: 贫困与发展、农民工与城镇化、农业可持续发展。

^① B. R. Schiller, *The Economics of Poverty and Discrimination*, New Jersey: Prentice-hall Inc., 1973, pp. 1-237; M. Ravallion, *The Economics of Poverty: History, Measurement, and Polic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6, pp. 1-10.

框架,对若干发展中国家的减贫问题开展了案例研究。^① 贫困研究按照贫困分析的一般逻辑,包括贫困定义与测量、贫困成因、反贫困战略与政策、扶贫瞄准、减贫效应、反贫困经验和理论等方面。参照这一逻辑结构,本文从宏观层面对如何认识贫困以及如何反贫困的相关内容进行了总结^②,评价研究进展及其演变轨迹,尤其是在理论借鉴的基础上产生的理论创新。这将有利于加深对中国反贫困研究进展的理解,并对下一步深化反贫困研究得出有益启发。

一、贫困理解和标准

对贫困的理解和定义是反贫困研究的起点。中国学术研究中关于贫困的定义经历了从温饱到基本需要、发展、知识、多维的转变,其中,对拓展性贫困定义的研究支撑了反贫困战略研究。改革开放后,对贫困问题的讨论随之出现。这一方面受到国际贫困理论的影响,另一方面也是开展扶贫和制定贫困标准的客观需要。中国在较长时间内对贫困没有明确的定义,大体上将温饱条件对应的消费水平界定为贫困户的标准。^③ 国内学界对贫困的理解可划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20世纪90年代围绕温饱问题所进行的贫困界定,第二阶段是2000年以后所开展的拓展性研究。对贫困标准的研究则建立在贫困定义和国际比较基础上。

1. 基于温饱的贫困定义

中国的基本需要型贫困定义研究集中于20世纪90年代,主要围绕温饱概念展开。1985年,国家统计局首次对贫困线进行测定,其所依据的贫困定义指物质生活困难,即一个人或一个家庭的生活水平达不到一种社会可以接受的最低标准,包括供应基本热量的食品需求和其他基本生活需要。^④ 周彬彬提出,绝对贫困的首要内涵是生存基本需要不能得到满足,其中最重要的是食品消费无法维持健康生理和日常活动的需要。^⑤ 同期,另一项对贫困线的研究也采取类似的绝对贫困定义。^⑥ 该研究的特点是在绝对贫困之下进一步划分出生存贫困,即“特困”或“极端贫困”。随后的研究基本都将中国官方定义的贫困视为基于温饱的绝对贫困。^⑦

2. 拓展的贫困定义

国际上关于贫困的定义除基本需要视角外,还有社会排斥、能力贫困、权利剥夺等视角。^⑧ 从发展脉络看,国内研究对贫困的理解呈现从基本需要型贫困到能力贫困和发展性贫困的演变。拓展的贫困定义代表了中国贫困理解的国际接轨。

知识贫困概念来源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人类贫困概念,对其中的知识维度和指标进行了拓展,所衡量的不仅是教育水平低下的程度,还包括获取、吸收和交流知识能力的匮乏或获取途径的缺乏。这里的知识是广义的,包括科学与技术、教育与培训、信息与网络。^⑨ 知识贫困没有超出能力贫困、多维贫困的范畴,但对反贫困战略调整的指向性更强,即更加重视知识发展战略和消除知识贫困。阿玛蒂亚·森认为,贫困是基本行为能力的剥夺,这成为国内研究能力贫困的理论基础。中国学者将行为能力贫困理论融入了亚当·斯密的基本需要贫困理论,认为能力不足是根源,福祉缺失是

^① Y. Bangura, *Developmental Pathways to Poverty Reduction Series*,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15. 该丛书对印度、南非、马来西亚和博茨瓦纳的减贫战略进行了分析。

^② 受篇幅限制,本文省略了关于贫困测量和分解、相对和多维贫困标准、减贫政策评价等内容。

^③ 湖南常德地区农村办公室经管科调查组《百户贫困户的调查》,《农业经济丛刊》1984年第1期。

^④ 唐平《中国农村贫困标准和贫困状况的初步研究》,《中国农村经济》1994年第6期。

^⑤ 周彬彬《人民公社时期的贫困问题》,《经济研究参考》1992年第21期。

^⑥ 童星、林闽钢《我国农村贫困标准线研究》,《中国社会科学》1994年第3期。

^⑦ 王萍萍、徐鑫、郝彦宏《中国农村贫困标准问题研究》,《调研世界》2015年第8期。

^⑧ 王小林《贫困测量:理论与方法》,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第12-15页。

^⑨ 胡鞍钢、李春波《新世纪的新贫困:知识贫困》,《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3期。

最终表现。^① 方黎明等应用森的行为能力贫困理论来分析中国开发式扶贫政策的不足, 并认为该理论落脚点在于重建个人能力。^② 梁伟军和焦丽丽结合行为能力贫困理论和可持续生计理论, 提出脱贫人口的发展能力结构概念, 认为发展能力可对应可持续生计概念中的五类资本, 提升脱贫人口发展能力是脱贫致富的必然要求。^③ 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提出发展贫困概念, 指贫困人口缺少自身发展和提高自身能力的机会, 如缺少受教育机会和必要的医疗条件。^④ 发展贫困既强调贫困人口自身能力的发展, 也强调外部发展条件的建立, 发展贫困比能力贫困更具社会性和综合性。邢占军和张丹婷则提出自身发展性需求得不到满足是相对贫困的内涵, 原因在于发展能力的不足, 因此, 相对贫困可以同时理解为能力贫困和发展性贫困。^⑤

3. 绝对贫困标准的测算及比较

中国政府先后制定了3个官方贫困标准, 分别是“1984年标准”“2008年标准”和“2010年标准”, 后者为按照2010年不变价每人每年2300元。^⑥ 国内对绝对贫困标准的研究呈现从标准测算、标准评价到标准比较的变化轨迹, 体现了对贫困的理解及其变化的影响。贫困标准测算的基本依据是最低营养摄入量和恩格尔系数, 分别可以采取马丁法或恩格尔系数法, 前者利用农户消费数据测算实际恩格尔系数, 后者只测算农户食物消费需求并使用给定的恩格尔系数。^⑦ 中国在制定和调整官方贫困标准时, 曾在1995年和1998年采用马丁法, 其他情况下均采用恩格尔系数法。^⑧ 中国贫困标准的最低营养摄入量一般采用国际常用的每天2100大卡热量, 代表“吃饱”。^⑨ 2010年, 贫困标准在2100大卡热量基础上增加了每天摄入60克蛋白质条件, 代表“适当吃好”。^⑩ 一些实证研究对中国贫困标准是否合宜进行了评价。汪三贵通过计算发现,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 中国农村合理的绝对贫困线应比当时的150元官方标准高50至110元。^⑪ 十余年后他又指出, 延续使用20多年的贫困标准过低, 原因在于马丁法低估了贫困人口的非食物消费支出。^⑫ 《中国发展报告2007》测算了“发展贫困线”, 2005年为1147元, 高于2008年标准但低于2010年标准。^⑬ 针对中国贫困标准偏低的质疑, 后来的研究将中国贫困标准与世界银行绝对贫困线进行了比较。研究显示, 中国2010年贫困标准达到每人每天1.6美元, 高于1.25美元国际贫困线(2005年PPP)。^⑭ 随后有研究显示, 如果将人均收入加上“两不愁三保障”扶贫措施的福利含金量, 那么2019年脱贫标准达到每人每天5.2美元, 远高于每人每天1.9美元国际贫困线, 接近中高收入国家每人每天5.5美元贫困线(2011年PPP)。^⑮

① 王小林 《贫困测量: 理论与方法》,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2年, 第12-15页。

② 方黎明、张秀兰 《中国农村扶贫的政策效应分析——基于能力贫困理论的考察》, 《财经研究》2007年第12期。

③ 梁伟军、焦丽丽 《能力贫困视阈下农村脱贫人口发展能力提升研究》, 《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2年第6期。

④ 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 《在发展中消除贫困》, 北京: 中国发展出版社, 2007年, 第20页。

⑤ 邢占军、张丹婷 《分层衔接: 迈向共同富裕的相对贫困治理机制》, 《社会》2022年第4期。

⑥ 李培林、魏后凯主编 《中国扶贫开发报告(2016)》,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6年, 第8页。

⑦ 杨立雄 《贫困线计算方法及调整机制比较研究》, 《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0年第5期。

⑧ 王萍萍、方湖柳、李兴平 《中国贫困标准与国际贫困标准的比较》, 《中国农村经济》2006年第12期。

⑨ 唐平 《中国农村贫困标准和贫困状况的初步研究》, 《中国农村经济》1994年第6期。

⑩ 王萍萍、徐鑫、郝彦宏 《中国农村贫困标准问题研究》, 《调研世界》2015年第8期。

⑪ 汪三贵 《中国农村的贫困问题》, 《农村经济与社会》1991年第6期。

⑫ 汪三贵 《中国农村贫困标准及低保对象》, 《中国社会保障》2007年第12期。

⑬ 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 《在发展中消除贫困》, 北京: 中国发展出版社, 2007年, 第35页。

⑭ 王萍萍、徐鑫、郝彦宏 《中国农村贫困标准问题研究》, 《调研世界》2015年第8期。

⑮ 吴国宝 《中国农村扶贫标准、对象识别和退出管理》, 载陈锡文、韩俊编 《中国脱贫攻坚的实践与经验》,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21年, 第43-70页。

二、贫困识别和瞄准偏差

中国的贫困识别单元从贫困地区向贫困县、贫困村、贫困户转变，识别精度不断提高。已有研究发现，以往各种贫困瞄准，包括低保，都存在较大偏差。从1995年提出瞄准贫困人口的政策建议到2014年变为现实，精准扶贫源于大幅度提高瞄准程度的实践要求。关于贫困识别偏差以及扶贫瞄准偏差的研究对精准扶贫措施的改进起到了推动作用。

1. 贫困识别偏差与精准识别

早期的贫困识别偏差研究以县为研究对象发现，历次确定的贫困县都有较明显的识别偏差，但偏差的性质不同。1986年确定的贫困县中，属于低收入组但未被评定为贫困县的情况严重，如最低10%收入组中，有一半的县没有被确定为贫困县，在10%—25%收入组中，有62%的县未被确定为贫困县，即“漏评”。1993年以来，为落实“八七扶贫攻坚计划”，新认定的贫困县从331个增加到592个，而其中符合贫困县标准的只有326个，其他为“错评”。为了享受扶贫政策，很多收入水平高于贫困县标准的县被保留或新纳入贫困县。^① 2001年再次识别贫困县时，漏评现象基本消除，但错评进一步增加。^② 近期有研究采用多维指标对贫困县和非贫困县的贫困程度进行重新测度，发现贵州省2014年有16个非贫困县达到多维贫困标准，同时有若干个国家级贫困县接近非贫困县标准。^③

2001年，全国第一次确定了14.8万个贫困村。学者通过收入组分析方法，对2001年贫困村数据进行分析发现，最低收入组中有45%的村未纳入贫困村，而高收入组中也存在大量贫困村。^④ 对2004年数据分析同样显示，贫困村覆盖不完全和非贫困村被评为贫困村的问题较严重，48%的村以收入为标准和在精确识别状态下应该被评定为贫困村但未被识别。由于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以及非贫困县存在更大的识别错误，贫困村瞄准错误率远远高于贫困县瞄准错误率。^⑤ 2014年开始开展的精准识别重新识别了12.8万个贫困村。由于存在精英俘获和选择性平衡考虑，所以贫困识别偏差仍然较大。^⑥

2007年，汪三贵等利用贫困监测数据，采用代理家计调查方法发现，在最好的情况下，73%的贫困人口可能被准确识别出来，但被识别为贫困人口的错误率高达70%。^⑦ 2016年6月，全国开展建档立卡“回头看”，补录贫困人口807万，剔除识别不准贫困人口929万，即漏评率和错评率分别为9%和10.4%。^⑧ 由于多种原因，对识别出的建档立卡贫困人口的准确性进行定量分析有很大的困难。所以，关于精准识别的分析更多是定性分析和小样本案例分析。

2. 扶贫瞄准偏差与精准扶贫

扶贫瞄准偏差是扶贫效率不足的一部分，主要指扶贫项目、资金、贷款覆盖贫困户的偏离程度。基本上各类研究都能得出相似结论，即中国的扶贫瞄准准确程度较低、偏差大。地区瞄准不仅使非贫困地区的贫困人口被忽视，而且在政策机制上使地方政府倾向于将扶贫资金投向非贫困地区和贫困户。^⑨ 分析显示，贫困县人均收入水平与扶贫资金分配没有明显联系，贴息贷款和以工代赈资金更多

① 李周编《中国反贫困与可持续发展》，北京：科学出版社，2007年，第22、129页。

② 岳希明、李实、王萍萍等《透视中国农村贫困》，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7年，第158-166页。

③ 贺立龙、左泽、罗樱浦《以多维度贫困测度法落实精准扶贫识别与施策——对贵州省50个贫困县的考察》，《经济纵横》2016年第7期。

④ A. Park, S. Wang, G. Wu, "Regional Poverty Targeting in China,"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Vol. 86, No. 1, 2002, pp. 123-153.

⑤ 汪三贵、A. Park, S. Chaudhuri, G. Datt《中国新时期农村扶贫与村级贫困瞄准》，《管理世界》2007年第1期。

⑥ 原贺贺《贫困村识别的基层实践逻辑解构——以湖北J县为例》，《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2期。

⑦ 汪三贵、王旭、王萍萍《中国农村贫困家庭的识别》，《农业技术经济》2007年第1期。

⑧ 刘永富《全面贯彻中央决策部署 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学习时报》2017年5月5日，第1版。

⑨ 刘文璞、吴国宝《地区经济增长和减缓贫困》，太原：山西经济出版社，1997年，第214-215页。

流向了人均收入较高的贫困县。^① 李小云等发现, 中央财政扶贫资金流出贫困县的比重超过了 70% 的规定, 项目依托式的扶贫资金到达贫困农户手中的比重最低。^② 以后的研究陆续发现, 扶贫项目、贫困村互助资金等更多流向了非贫困户, 这被归结为精英俘获。^③ 贷款是实现扶贫资源瞄准到户的有效手段, 但 1989 年扶贫政策从重视扶贫贴息贷款转向鼓励发展经济实体来间接帮助贫困人口。20 世纪 90 年代, 关于扶贫贷款使用瞄准和效果的研究发现, 将扶贫贷款投向企业和非农产业是错误的急功近利行为, 因为其对贫困户的减贫效应很弱, 预期的目标瞄准功能并未充分发挥出来。^④ 此外, 一个未得到重视的问题是, 贫困户可能存在贷款有效需求障碍。^⑤ 这个现象直到 2010 年以后依然存在。^⑥

除了精准识别, 精准扶贫内涵还包括精准帮扶和精准脱贫, 包括政策措施的瞄准、帮扶力量的配置和瞄准、脱贫结果的评估和确认等, 是一个完整的体系。^⑦ 精准扶贫与国外的瞄准扶贫有根本性区别, 体现在全面瞄准和全方位精准、采取以发展生产为主的综合性措施和扶贫攻坚等方面。^⑧ 但精准扶贫同样存在瞄准偏差和效果问题, 包括识别偏差; 精准扶贫政策的不精准执行; 产生“养懒汉”“过度扶贫”等逆向激励效应; 脱贫责权划分不明确, 尤其是扶贫对象责权不清晰; 扶贫措施与贫困户实际需求并非真正匹配。^⑨

三、反贫困战略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起, 中国学术界先后开展了以贫困人口为中心的扶贫战略以及综合性反贫困战略研究, 对 21 世纪的国家反贫困战略和政策产生了积极影响。从区域开发扶贫转向经济增长、开发式扶贫与社会保护“三轨”并行, 基本上与国际理论创新同步。中国的反贫困战略研究始终强调生态保护, 并在此基础上提出绿色减贫理论。全面脱贫后的反贫困战略研究总体指向解决相对贫困, 但如何影响国家政策还有待于进一步观察。

1. 以贫困人口为中心的扶贫战略

从区域开发战略转向以贫困人口为中心的反贫困战略, 是中国 20 世纪 90 年代及以后一段时期的重要研究成果。康晓光首先提出 20 世纪 90 年代中国具备消除绝对贫困条件这一命题, 并在此基础上构建了由 4 个相互关联部分构成的反贫困战略, 分别是提供经济机会、提高贫困人口能力、建设社会保障网络、开展贫困地区经济社会改革和反贫困制度创新。^⑩ 吴国宝首先论证了扶贫战略需要满足的 4 个条件, 即对象不遗漏、能够快速启动、扶贫效率高、不会产生福利依赖, 并发现区域开发扶贫战略存在地方政府目标冲突以及政府与市场冲突, 因此建议转向瞄准贫困人口的扶贫战略, 将就地

^① A. Park, S. Wang, G. Wu, “Regional Poverty Targeting in China,”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Vol. 86, No. 1, 2002, pp. 123-153.

^② 李小云、张雪梅、唐丽霞 《我国中央财政扶贫资金的瞄准分析》, 《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5 年第 3 期。

^③ 邢成举、李小云 《精英俘获与财政扶贫项目目标偏离的研究》, 《中国行政管理》2013 年第 9 期; 胡联、汪三贵、王娜: 《贫困村互助资金存在精英俘获吗——基于 5 省 30 个贫困村互助资金试点村的经验证据》, 《经济学家》2015 年第 9 期。

^④ 黄季焜、马恒运、罗泽尔 《中国的扶贫问题和政策》, 《改革》1998 年第 4 期; 李小云、张雪梅、唐丽霞 《我国中央财政扶贫资金的瞄准分析》, 《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5 年第 3 期。

^⑤ 林万龙、杨丛丛 《贫困农户能有效利用扶贫型小额信贷服务吗? ——对四川省仪陇县贫困村互助资金试点的案例分析》, 《中国农村经济》2012 年第 2 期。

^⑥ 吴本健、马九杰、丁冬 《扶贫贴息制度改革与“贫困瞄准”: 理论框架和经验证据》, 《财经研究》2014 年第 8 期。

^⑦ 汪三贵、郭子豪 《论中国的精准扶贫》, 《贵州社会科学》2015 年第 5 期。

^⑧ 檀学文、李静 《习近平精准扶贫思想实践深化研究》, 《中国农村经济》2017 年第 9 期。

^⑨ 李博、左停 《谁是贫困户? 精准扶贫中精准识别的国家逻辑与乡土困境》,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7 年第 4 期; 雷望红 《论精准扶贫政策的不精准执行》,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7 年第 1 期; 檀学文 《完善现行精准扶贫体制机制研究》, 《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7 年第 5 期; 黄承伟、覃志敏 《我国农村贫困治理体系演进与精准扶贫》, 《开发研究》2015 年第 2 期。

^⑩ 康晓光 《90 年代我国的贫困与反贫困问题分析》, 《战略与管理》1995 年第 4 期。

开发扶贫、迁移和转移就业与建立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结合起来。^① 陈凡分析了反贫困战略要素之间的矛盾,得出反贫困战略调整的思路,即从区域瞄准转向贫困村和贫困人口瞄准,对扶贫对象进行类型划分,改造传统农业,实施针对绝对贫困人口的特殊政策。^② 都阳和蔡昉指出,21世纪初,中国农村贫困的性质逐渐过渡到个体性贫困,以边缘化贫困人口为主。扶贫战略需要从区域瞄准向个体瞄准转变,因此建立和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尤其重要。^③ 刘奇在2010年提出了重构中国扶贫战略的思路,明确提出了精准扶贫建议,并提出由扶贫转向防贫,随着国力增强不断扩大扶贫规模。^④

2. 综合性反贫困战略

中国的反贫困战略思路从开始就是综合性的。^⑤ 世界银行提出了20世纪90年代中国扶贫战略的建议,即以贫困人口中的最贫困者为目标,集中加强开发和社会服务支持。^⑥ 尽管这项研究提出以贫困者为目标,但总的来说还是一种区域发展战略,更强调农业和乡镇企业的作用。当时陆续有调查发现,一大批失能人口无法依靠开发式扶贫脱贫,开发式扶贫与社会保障的结合应该是农村扶贫的方向。^⑦ 随后,中国学者提出了更具综合性的“三轨制”反贫困战略思路,即经济增长、开发式扶贫和社会保障“三轨并立”或“三管齐下”。^⑧ “三轨制”反贫困战略的一个创新论点是从社会保障向社会保护转型。除社会保障外,社会保护的内涵还包括人力资本投资、风险管理以及创造就业机会,从而达到预防贫困的目的。^⑨ 朱玲和何伟也指出,社会保护应在下一步反贫困战略中发挥主导作用。^⑩

3. 生态保护的扶贫战略

在中国反贫困战略研究中,生态保护的角色从改善发展方式以加强生态保护逐步转向减贫与绿色协同发展。王小强等较早注意到生态失调与经济发展困难并存。^⑪ 厉以宁探讨了经济运行机制在协调贫困地区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关系方面的效应,提出通过转换经济运行机制来摆脱低收入与生态破坏的恶性循环。^⑫ 李周分析了生态敏感地区、自然资源丰富地区和生物多样性丰富地区的贫困问题,提出发挥各自比较优势,建立竞争性市场。^⑬ 绿色减贫是一种符合生态文明发展、实现绿色增长的减贫新理念,是把生态文明与反贫困有机结合起来减贫新战略。^⑭ 绿色减贫战略被认为是突破减贫瓶颈的关键,其根本方法是在贫困地区走可持续发展道路,守住发展和生态两条底线。^⑮

4. 未来的反贫困战略转型

在绝对贫困即将消除之际,中国学者对未来反贫困战略转型开展了一系列研究。大部分研究都认为,未来的反贫困对象是相对贫困,但要叠加多维贫困,或叠加更高标准的绝对贫困,或侧重于老少

① 吴国宝 《对中国扶贫战略的简评》,《中国农村经济》1996年第8期。

② 陈凡 《中国反贫困战略的矛盾分析与重新构建》,《中国农村经济》1998年第9期。

③ 都阳、蔡昉 《中国农村贫困性质的变化与扶贫战略调整》,《中国农村观察》2005年第5期。

④ 刘奇 《创新思维:重构中国扶贫战略》,《中国发展观察》2010年第10期。

⑤ 朱玲 《中国扶贫理论和政策研究评述》,《管理世界》1992年第4期。

⑥ 世界银行 《中国:90年代的扶贫战略》,高鸿宾、张一明、叶光庆译,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3年,第6-9页。

⑦ 朱玲 《制度安排在扶贫计划实施中的作用——云南少数民族地区扶贫攻坚战考察》,《经济研究》1996年第4期。

⑧ 张晓山、李周主编 《中国农村改革30年研究》,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2009年,第357-386页;贺雪峰 《中国农村反贫困战略中的扶贫政策与社会保障政策》,《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3期。

⑨ 徐月宾、刘凤芹、张秀兰 《中国农村反贫困政策的反思——从社会救助向社会保护转变》,《中国社会科学》2007年第3期。

⑩ 朱玲、何伟 《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的乡村减贫40年》,《劳动经济研究》2018年第4期。

⑪ 王小强、白南风 《富饶的贫困——中国落后地区的经济考察》,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45页。

⑫ 厉以宁 《贫困地区经济与环境的协调发展》,《中国社会科学》1991年第7期。

⑬ 李周 《资源、环境与贫困关系的研究》,《云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5期。

⑭ 张琦、冯丹萌 《绿色减贫:可持续扶贫脱贫的理论与实践新探索(2013—2017)》,《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1期。

⑮ 雷明 《两山理论与绿色减贫》,《经济研究参考》2015年第64期。

病残等特殊群体的贫困。^①个别研究反对马上转向解决相对贫困,主要理由是公共财力的不足。^②关于反贫困的地域范围,各研究基本上都认同需要统筹城乡反贫困,尤其是城镇反贫困需要提上议事日程。^③关于反贫困思路,多数研究认同要转向常规性或常态化反贫困机制,从扶贫转向防贫,以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为主要手段。^④总体来讲,未来的反贫困战略仍然是综合性的。檀学文将其概括为新“三支柱”战略,包括包容性增长、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以及社会保护。^⑤叶兴庆和殷浩栋也提出了类似思路,包括有利于低收入群体增收的产业政策、对发展型低收入群体的救助政策、以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为基础的防贫政策。^⑥

与此同时,学界也提出了低收入人口走向共同富裕的研究视角。杨立雄提出,要采取提升低收入群体的市场竞争力、完善公共服务体系、加大转移支付力度等政策措施,大幅度提高低收入群体收入水平,逐步缩小收入差距,从而实现共同富裕。^⑦林闽钢论证了低收入群体是促进共同富裕的重点帮扶保障对象,政策取向包括发挥基本公共服务的支持作用以及采取以就业为核心的增收性帮扶政策和以纾困为核心的综合性保障政策。^⑧

四、反贫困经验

中国减贫经验的研究集中于2018年至2020年,呈现从归纳减贫成功的实践经验向对大规模减贫乃至消除贫困的经验进行总结的演变。各项研究中的共识性认识包括改革开放和实施综合发展战略的重要性;在推进包容性发展的同时长期实施开发式扶贫;坚持政府在扶贫中的主导作用;坚持提高贫困人口自我发展能力;坚持适时调整扶贫战略和政策;逐步提高扶贫标准以及瞄准的精确程度。

1. 国家治理角度的反贫困经验

范小建较早地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到2020年基本消除绝对贫困的角度总结了中国的扶贫经验,并将其归纳为7个方面:解放思想,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改革开放,尤其是实施农村改革;由执政党的宗旨所决定的政府主导;有组织、有计划的社会参与;通过开发式扶贫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通过使有劳动能力的贫困人口获得发展能力以实现其自力更生;强调综合开发、全面发展从而实现科学发展。^⑨吴国宝将中国减贫经验概括为:通过发展减贫;提升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自我发展能力;实行精准扶贫;坚持扶贫创新;坚持党和政府领导、群众主体、社会参与的基本扶贫制度;坚持持续扶贫。^⑩李实和沈扬扬指出,中国的扶贫成就不仅在于消除绝对贫困,更在于中国政府在增进人民福祉、促进共同富裕方面所作出的不懈努力,具体经验体现为“五项坚持”,即坚持政府领导与主导,坚持农村改革与扶贫相结合,坚持以经济增长带动脱贫,坚持开发式扶贫与兜底保障政策相结

① 张琦、孔梅、万君 《对2020年后我国减贫战略方向及重点的思考》,《社会治理》2020年第11期;何秀荣 《改革40年的农村反贫困认识与后脱贫战略前瞻》,《农村经济》2018年第11期;陈志钢、毕洁颖、吴国宝等 《中国扶贫现状与演进以及2020年后的扶贫愿景和战略重点》,《中国农村经济》2019年第1期。

② 汪晨、万广华、吴万宗 《中国减贫战略转型及其面临的挑战》,《中国工业经济》2020年第1期。

③ 魏后凯 《2020年后中国减贫的新战略》,《中州学刊》2018年第9期;叶兴庆、殷浩栋 《从消除绝对贫困到缓解相对贫困:中国减贫历程与2020年后的减贫战略》,《改革》2019年第12期。

④ 李小云、苑军军、于乐荣 《论2020后农村减贫战略与政策:从“扶贫”向“防贫”的转变》,《农业经济问题》2020年第2期;陈志钢、毕洁颖、吴国宝等 《中国扶贫现状与演进以及2020年后的扶贫愿景和战略重点》,《中国农村经济》2019年第1期。

⑤ 檀学文 《走向共同富裕的解决相对贫困思路研究》,《中国农村经济》2020年第6期。

⑥ 叶兴庆、殷浩栋 《从消除绝对贫困到缓解相对贫困:中国减贫历程与2020年后的减贫战略》,《改革》2019年第12期。

⑦ 杨立雄 《低收入群体共同富裕问题研究》,《社会保障评论》2021年第4期。

⑧ 林闽钢 《促进低收入群体迈向共同富裕论纲》,《治理研究》2022年第5期。

⑨ 范小建 《中国特色扶贫开发的基本经验》,《求是》2007年第23期。

⑩ 吴国宝 《改革开放40年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的成就及经验》,《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6期。

合,坚持动员社会力量参与扶贫工作。^①

2. 改革和转型角度的反贫困经验

李小云等认为中国大规模减贫具备特定的政治基础、历史基础、经济动力机制以及社会文化机制,进而形成了3条贫困治理的基本经验:一是基于市场的开发式扶贫手段,准确地说是经济发展加特殊扶持的双重开发式治理;二是针对区域与个体的瞄准机制,且从区域瞄准逐步过渡到村庄瞄准和个体瞄准;三是政府主导、全社会参与的扶贫机制,将再分配资源转化为开发性资源,强化开发式扶贫机制。^②他们还认为,消除贫困是经济社会转型的突出成就,开发式扶贫则是中国40年减贫的根本经验。即便在经济增长、社会公平有利于减贫的条件下,国家依然需要通过扶贫干预为贫困人口创造机会和条件;当经济增长和社会公平不利于贫困人口的发展时,则更需要在国家强有力的干预下,通过全面的扶贫政策实现持续减贫。^③朱玲和何伟则将中国减贫的主要经验归结为制度变革,即逐步破除城乡二元分割制度,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进一步伴随着农业劳动力转移对城乡二元制度壁垒的冲击,而贫困人口生产力则在这一过程中得以释放。^④

3. 中国减贫经验的可借鉴性研究

早期的扶贫经验研究的主要目的是为下一阶段减贫提供借鉴,近年来的研究则更倾向于阐述中国减贫实践中的一般性经验,力图使其对其他发展中国家有借鉴意义。吴国宝认为,虽然中国扶贫成就中内含独特的时空因素、政治制度与治理体系的影响,但其大规模减贫的经验可以与其他国家分享。^⑤李小云等指出,中国减贫经验已发展为全球发展知识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政府的主导作用、优先发展农业以及将农村工业与城市的发展有机连接起来,均是可以国际共享的经验。^⑥另一项研究从国际视野总结了中国的综合减贫道路、经济发展主导的减贫路径、政府主导与国际合作及社会参与的有机结合、坚持提高扶贫对象的自我发展能力以及全方位扶贫创新等经验都具有普遍借鉴意义。在减贫最后阶段实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方略,对于条件接近的发展中国家也具有借鉴意义。^⑦

五、消除贫困的理论解释

随着中国消除绝对贫困成效的显现以及中国特色反贫困理论的提出,近年来关于中国消除贫困的理论解释趋于增加,其关注的要点是如何以与国际理论对话的方式对中国的成就给出合理解释。现有研究大体上可分为两方面:一方面是对中国减贫实践以及中国特色反贫困理论进行学理性阐释,另一方面是对中国消除贫困的成就做出新的理论解释。

1. 对中国特色反贫困理论的学理性阐释

张琦和冯丹萌在总结中国的扶贫实践创新时归纳了若干项减贫理论创新,主要有4个方面:一是围绕贫困标准的理论创新,尤其是贫困标准提高所体现的贫困内涵变化以及多维贫困的应用;二是开发式扶贫理论,体现在产业可持续发展、注重贫困人口自身能力发展以及注重改善区域环境和消除致贫因素等;三是绿色减贫理论;四是内源脱贫理论。^⑧黄承伟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扶贫开

① 李实、沈扬扬 《中国的减贫经验与展望》,《农业经济问题》2021年第5期。

② 李小云、徐进、于乐荣 《中国减贫的基本经验》,《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4期。

③ 李小云、徐进、于乐荣 《中国减贫四十年:基于历史与社会学的尝试性解释》,《社会学研究》2018年第6期。

④ 朱玲、何伟 《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的乡村减贫40年》,《劳动经济研究》2018年第4期。

⑤ 吴国宝 《改革开放40年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的成就及经验》,《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6期。

⑥ 李小云、马洁文、唐丽霞等 《关于中国减贫经验国际化的讨论》,《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5期。

⑦ 魏后凯、王镭主编 《中国减贫成就、经验和国际合作》,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1年,第23-32页。

⑧ 张琦、冯丹萌 《我国减贫实践探索及其理论创新:1978—2016年》,《改革》2016年第4期。

发战略思想把中国扶贫开发理论创新提升到了新的历史高度，主要体现为：把扶贫开发确定为国家战略，把消除贫困作为底线任务，实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方略，论述内源扶贫、科学扶贫、精神脱贫等扶贫脱贫机制模式，提倡共建没有贫困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等。^① 黄承伟还阐述了习近平扶贫论述对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的原创性贡献：从发展全局确定脱贫攻坚的战略地位，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反贫困定位理论；总结“六个坚持”经验，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反贫困路径理论；从携手消除贫困、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高度指明全球减贫合作方向，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② 王禹澔认为，新时代中国特色反贫困理论具有强化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守以人民为中心的反贫困理念、以精准扶贫为方略而使贫困治理更科学有效、强调多方协同治理等鲜明特征，从反贫困的认知、方法和目的等维度超越西方反贫困理论。^③ 黄祖辉等则概括了中国特色反贫困理论的理论渊源“高度”、理论创新“广度”和理论建构“效度”，以全面反贫困理念为内在统领，形成体系化的反贫困系统建构。^④

2. 对中国消除贫困成就的理论解释

近年来一些学者尝试从基本理论和基本逻辑出发，以新的理论建构对中国消除贫困成就进行理论解释。其中较突出的有贫困治理研究和政治经济学研究两方面。

从贫困治理角度，已有研究致力于解释中国贫困治理的运行机理、有效性及一般性。王小林等构建了贫困治理分析框架，包括贫困问题、减贫战略、扶贫行动者、治理过程和治理结构五部分，分别从“水平治理”与“垂直治理”来分析中国贫困治理结构和机制。该框架既可以解释绝对贫困治理运行机制，也可以用于对相对贫困治理的分析。^⑤ 谢岳则分析了中国贫困治理的政治逻辑，中国以福利分配为导向的贫困治理是一种普遍的人民福利，是一种基于共同富裕和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的国家目标，是一种旨在帮助贫困人口形成致富能力的发展意义上的分配制度。中国共产党的政治领导力转换为现代化的国家治理能力，激发了地方政府与社会协同治理的活力，形成宏观、中观、微观3个层面贫困治理机制，分别是中央理性化配置财政资源、贫困治理的责任化以及在基层社会拓展政治网络。^⑥ 杨灿明认为中国形成了“理论、理念、制度和机制‘四位一体’”的综合性减贫体系，其中中国特色减贫理论融合了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共同富裕和人的全面发展理论的精髓，进而实现了亲贫式发展。^⑦ 郑宇则从中国的渐进式改革受到启发，以渐进平衡来描述中国的贫困治理模式，即通过市场联动、政府社会协同和目标演进这三重机制的共同作用，实现从不平衡到平衡发展。通过对非洲国家贫困治理的分析，渐进平衡的贫困治理模式展示了理解发展中国家贫困治理的一般性逻辑。^⑧

学者们致力于阐释减贫制度或政治行动背后的政治经济学原理。蒋永穆等提出，马克思主义减贫理论的核心是制度减贫，中国形成了基于自身实践的制度减贫理论体系。制度减贫理论在西方理论中可归属于结构主义理论，西方减贫理论淡化或排斥制度减贫。^⑨ “中国减贫学”被认为是既有助于减贫、又有利于发展的政治经济学分配理论，其核心要义是锚定共同富裕目标，依托精准手段，构建政

① 黄承伟 《党的十八大以来脱贫攻坚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总结》，《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5期。

② 黄承伟 《中国减贫理论新发展对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的原创性贡献及其历史世界意义》，《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1期。

③ 王禹澔 《共同富裕与中国特色反贫困理论对西方减贫理论的超越》，《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22年第2期。

④ 黄祖辉、李锋、钱振澜 《中国特色反贫困理论的理论品格、时代特质与系统建构》，《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3期。

⑤ 王小林、张晓颖 《中国消除绝对贫困的经验解释与2020年后相对贫困治理取向》，《中国农村经济》2021年第2期。

⑥ 谢岳 《中国贫困治理的政治逻辑——兼论对西方福利国家理论的超越》，《中国社会科学》2020年第10期。

⑦ 杨灿明 《中国战胜农村贫困的百年实践探索与理论创新》，《管理世界》2021年第11期。

⑧ 郑宇 《贫困治理的渐进平衡模式：基于中国经验的理论建构与检验》，《中国社会科学》2022年第2期。

⑨ 蒋永穆、万腾、卢洋 《中国消除绝对贫困的政治经济学分析——基于马克思主义制度减贫理论》，《社会科学战线》2020年第9期。

府、市场和社会协同发力的“益贫市场”，解放贫困者的生产力，使他们不仅成为分配的受益者，也成为增长的贡献者。其中，有为政府的作用体现为“赋能之手”，所形成的益贫市场是再造的市场，而不是扭曲的市场。^①钟甫宁对贫困地区“反市场”的资源逆向流动做出了经济学解释，即单一资源追逐自身利益的流动方式既不能使全局资源最优配置，更不能缓解区域性贫困。开发式扶贫通过公共投资和政策引导改变资源配置决策和流向，从追求单一资源配置效率转向实现整合资源的最大整体利益，进而实现所有利益相关者共同收益。^②朱玲和何伟则从改革和经济自由角度对减贫成就做出了解释，对于未来的政策建议是消除城乡居民权利不平等以及排除对贫困户经营决策权的干预。^③

六、中国反贫困研究的理论创新评价

按照反贫困研究一般逻辑，本文梳理了自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反贫困研究的沿革和进展，主要发现如下：第一，对于贫困的理解经历了从基于温饱的绝对贫困向能力贫困和发展性贫困的演变。近年来国内有不少研究采纳相对贫困和多维贫困定义，但基本上属于“拿来主义”，并未对其概念进行严格论证，目前能力贫困和发展性贫困的概念还不够成熟。第二，对贫困标准的研究以绝对贫困标准研究见长，经历了标准测算、标准评价到标准比较的演变，较好地论证了绝对贫困内涵，并解释了中国贫困标准从偏低到不断提高的转变，尤其是脱贫标准已远远高于绝对贫困标准。第三，中国的反贫困战略研究成果与时俱进且具有超前性，对国家反贫困战略转型发挥了理论引领作用，包括以贫困人口为中心的反贫困战略、综合性反贫困战略、绿色减贫战略等。但关于2020年后反贫困战略的研究成果尚未在新时期战略转型决策中体现。第四，关于贫困识别和瞄准偏差的研究因贫困县划分、贫困人口识别等丰富的政策实践而取得有益成果，其研究发现对调整扶贫政策、实施精准扶贫方略起到了促进作用。逻辑上，扶贫政策是否有效也属于瞄准效率范畴，但受理论和数据约束，这类研究并不充分。第五，已有研究对中国减贫经验进行了充分总结，主要结论相当接近，但对中国消除贫困经验对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借鉴研究还不够充分。第六，中国特色反贫困理论经一些学者的阐释而变得更加具有条理性 and 系统性，一般认为它是对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的继承和原创性贡献。第七，对于中国消除贫困成就的解释是近年来的重点研究领域，学界先后提出了发展性分配、渐进平衡治理、益贫市场、逆向资源配置等理论假说。如何从中国反贫困实践中提炼和创新反贫困理论仍是今后一段时期的重要研究任务。

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反贫困研究是一个学习与创新同步的过程。一方面，在贫困标准比较、贫困识别和瞄准偏差等方面，我们及时学习和借鉴了国外已有的成熟理论和方法；另一方面，在综合性反贫困战略、绿色减贫、精准扶贫、益贫市场、逆向资源配置等方面都具有较明显的基于中国实践的理论创新特征。但中国的反贫困理论创新还不够充分，反贫困理论体系还不完善。随着中国经济社会治理模式的进一步完善、国内建立低收入人口长效帮扶机制以及国际反贫困的推进，中国反贫困研究还存在广阔的理论创新空间。

责任编辑：刘雅君

^① 新华社中国减贫学课题组编著《中国减贫学：政治经济学视野下的中国减贫理论和实践》，北京：新华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21年，第116-117页。

^② 钟甫宁《中国农村脱贫历史性成就的经济学解释》，《农业经济问题》2021年第5期。

^③ 朱玲、何伟《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的乡村减贫40年》，《劳动经济研究》2018年第4期。